

美国选区对华出口与涉华态度^{*}

刁大明◎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实现了稳步而持续的增长。虽然美国国会众议院各选区均在不同程度上从中获益，但对华出口在区域分布上仍较为集中，并不均衡。在对 2000—2008 年各国众议院选区对华出口额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本文发现对华出口额增长率越高的众议院选区，其议员越不容易持有消极的涉华态度，而对华出口额总量对其选区议员涉华态度构成的影响极为微弱。同时，议员本人的党派与意识形态立场、议员是否为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以及选区亚裔比例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其涉华态度。基于这一发现，本文最后尝试提出一些深化中美经贸关系、推进经济外交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美国国会众议院 选区对华出口 议员涉华态度
中美经贸关系

20 01 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 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得到了持续而快速的发展，相互依赖的格局初步形成。^① 中

^{*} 感谢《国际政治科学》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

^① 孙哲、李巍《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8 页。

美双方已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据美国国际贸易署(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统计,中国不仅已是美国的最大进口国,而且一跃成为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其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①又据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布的《各州和国会众议院选区对华出口调查报告》^②显示,美国全部435个国会众议院选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展均获益于对华出口。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布的报告指出,即使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美经贸发展仍旧动力强劲,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与2008年持平,而同期美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则下降了近20%。^③事实上,作为积极促进中美经贸合作的美国企业界协会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已发布了2000—2011年的同主题报告,其结论均认为对华出口惠及美国国会各选区。^④该年度报告所揭示的事实,得到了中国各界的广泛关注,相关官方表态和媒体评论皆将其视为中美关系“互利共赢”的又一例证。^⑤

众所周知,美方对华贸易逆差巨大,美国一些政治人物时常以此为“大做文章”,攻击中国。^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逐年稳步攀升所产生的政治效应更为值得关注。事实上,以各州、国会众议院选区作为对华出口额的统计单位,就是将国会选区利益与对华贸易联系起来,进而引出了一组重要的问题:对华出口使选区获益的事实,是否影响着该选区

① 美国国际贸易署官方网站数据, http://www.trade.gov/mas/ian/build/groups/public/@tg_ian/documents/webcontent/tg_ian_003364.pdf, 2012年7月9日访问。

② 该报告中的对华出口,专指美国向中国内地的贸易出口。

③ 马小宁:《中国市场是美国公司增长动力》,《人民日报》2010年8月4日,第3版。

④ 参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官方网站的专题网页, <http://www.uschina.org/info/index.php#trade>。

⑤ 如:中国政府官方网站2009年8月4日刊载评论《关注对华贸易保护》, http://www.gov.cn/jrzq/2009-08/04/content_1383208.htm; 中国驻美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官方网站2007年5月3日刊载相关新闻, <http://us.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705/20070504635444.html>; 新华网2009年9月7日刊载评论《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9/07/content_12009119.htm; 新华网2011年8月17日刊载评论《报告显示多数美国地区向中国出口超过其他市场》,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8/17/c_121874514.htm。

⑥ 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125页。

议员的涉华态度？如果有影响，其中作用机理如何铺陈？如果没有影响，又作何解释？破解这些疑问，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国会政治与中美经贸关系的互动给予了持续关注，对相关理论、历史变迁以及关键案例等都展开了较为深入地描述、梳理与讨论。^① 本文将以 2000—2008 年国会众议院选区的对华出口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对华出口对国会议员涉华态度的影响。选取该组数据的原因有三：其一，观察议员涉华行为往往以一届国会（两年）为基本单位，2000—2008 年覆盖了 107 届、108 届、109 届及 110 届四届国会。2000 年为第 107 届国会的前一年，2008 年为第 110 届国会的最后一年，足以反映一个完整的阶段性变化态势。其二，2009 年之后的数据虽总体与 2008 年持平，但由于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在各选区分布上仍旧呈现出较大调整，是否代表整体趋势尚待观察，因而没有统计。其三，众议院各选区人口规模接近，相比参议院选区（即各州）人口经济规模等差异较大的事实而言，更具分析意义与解释力。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首先对 2000—2008 年各众议院选区对华出口分布以及变化情况作简要评述，进而梳理国会众议员涉华态度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而后指明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来源与方法，此后报告研究的发现及其解释，最后基于研究的主要发现尝试提炼出一些对策建议。

一、对华出口的选区分布

自 2000 年至 2008 年的 9 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呈现出逐年激增的态

①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孙哲、李巍 《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倪世雄、李淑俊 《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关系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81—94 页；孙哲、成帅华 《美国国会与后 PNTR 时代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太平洋学报》2001 年第 3 期，第 53—60 页；冼国明、张岸元 《跨国公司与美国国会对于华政治》，《世界经济》2004 年第 4 期，第 23—29 页；李淑俊、沈昕 《放大与稀释：国会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教育与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80—88 页。

势,从2000年的162亿美元至2008年的715亿美元,增幅达341.36%,远远超出同期美国出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约60%的增长率。

从选区所属的区域(region)加以观察,^①就总量而言,2000年选区平均对华出口额最大者位于太平洋地区(4.55亿美元),最小者则在东南中部地区(1946万美元),后者仅为前者的1/23。到2008年,最大的仍在太平洋地区(12.87亿美元),最小者则转至西北中部地区(1.23亿美元),前者约是后者的10.5倍,差距明显缩小。就增长率而言,太平洋地区各选区在9年中平均增长183%,位列9个区域最末,而2000年和2008年分列选区平均最小出口额的东南中部和西北中部两地区,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52%和397%,是增长率第2和第3的区域。增长最快的选区位于山区,选区平均出口额从2000年的4193万美元增长为2008年的2.99亿美元,增长率为614%。相比而言,南大西洋地区的各选区在总量和增长率上均尚有发展空间:该区域2000年选区平均对华出口额仅为4355万美元(位列第6),2008年为1.43亿美元(位列第7),增长率为228%(位列第8)。

从选区对华出口额的区域分布比较中可见,在保持太平洋地区特别是西海岸各州在IT产业和航空运输设备制造产业上的对华高额出口的同时,由于IT产业向内陆扩展转移等原因,紧邻西海岸的山区跃为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该区域8个州中的5个州以IT业为

① 美国国家人口普查局根据美国政治经济情况而制定的区域划分方式,将美国划分为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地区、东北中部地区、西北中部地区、南大西洋地区、东南中部地区、西南中部地区、山区以及太平洋地区等九个区域。其中,新英格兰地区包括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马萨诸塞、罗德岛以及康涅狄格等六州;中大西洋地区包括纽约、新泽西以及宾夕法尼亚等三州;东北中部地区包括密歇根、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以及威斯康星等五州;西北中部地区包括明尼苏达、艾奥瓦、密苏里、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以及堪萨斯等七州;南大西洋地区包括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以及佛罗里达等八州;东南中部地区包括肯塔基、田纳西、密西西比以及亚拉巴马等四州;西南中部地区包括阿肯色、路易斯安那、俄克拉荷马以及得克萨斯等四州;山区包括蒙大拿、怀俄明、爱达荷、科罗拉多、犹他、内华达、新墨西哥以及亚利桑那等八州;太平洋地区包括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斯加以及夏威夷等五州。

最大对华出口产业。与此同时，西北中部和东南中部两区域各选区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与其农业生产和机械制造等在对华贸易中存在优势有关。相对而言，南大西洋地区各选区的相对缓慢则可解释为该区域内纺织业、手工制造业等对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相对有限。总体上讲，美国各区域内的各选区的确都在对华贸易中实现了收益，且区域间差异正在缩小。但在 2000—2008 年中，仅太平洋地区各选区的对华出口额就占全美总额的 55%，也表明美国对华贸易的区域分布仍极不均衡。

从众议院选区层次加以观察，就总量而言，2000—2008 年内选区对华出口总额最大的 10 个选区集中在西海岸的加州（7 个）和华盛顿州（3 个），产业则集中在 IT 产业和航空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与区域分布趋同。^① 其中出口总额最大的是华盛顿第 2 选区（246.36 亿美元），选区内坐落着全球最大航空器制造商波音公司（Boeing）最大规模的生产线。该选区众议员为民主党人里克·拉森（Rick Larsen），他长期担任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联席主席，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②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州第 46 选区的对华出口也高达 200.10 亿美元，排名第 4，其众议员共和党人达纳·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却先后主导建立了众议院“台湾连线”和“西藏连线”，对华立场极为消极。^③ 由此可见，对华出口额的多寡对选区议员对华态度的影响并非单方向的，可能更为复杂。相比而言，2000—2008 年选区对华出口总额最小的 10 个选区变化较大，只有新墨西哥州第 1 选区和肯塔基州第 5 选区始终处于出口额最小的

① 依次为 WA-02、CA-42、WA-01、CA-46、CA-25、CA-26、CA-22、CA-11、WA-09 以及 CA-27 等选区。这里采用国会选区通常的标记方式，两个大写字母为州名缩写，两位数字为该州国会众议院选区的编号。全文同。

② 刁大明、张光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议题连线构成动因的比较研究》，《外交评论》2009 年第 6 期，第 101—111 页。

③ 张光、刁大明主编 《美国国会研究手册（2007—200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8 页 “US Lawmakers Form New Caucus on Tibet,” <http://www.voanews.com/tibetan-english/news/a-28-2008-04-02-voa2-90301602.html?textmode=0>，2010 年 8 月 26 日访问。

10 个之列, 总量分别为 4100 万和 8000 万美元。^① 前者主要以新墨西哥州最大城市阿尔伯克基 (Albuquerque) 为主体, 军工安全相关产业分布密集, 可能构成限制其对华出口的部分原因。^② 后者位于肯塔基州东南部, 以煤矿为主要产业, 对华出口空间有限。^③ 2000—2008 年间, 两个选区众议员分别为希瑟·威尔逊 (Heather Wilson) 和哈罗德·罗杰斯 (Harold Rogers), 均为共和党人, 且皆为“美中工作小组”成员, 后者还参与了“台湾连线”。

就 2000—2008 年选区对华出口额的增长率而言, 增长率最高的 10 个选区集中在山区和太平洋地区, 其中犹他州全部 3 个选区和夏威夷州全部 2 个选区分别在列, 又以夏威夷州第 1 选区的 1700% 为最高。^④ 前者是以 IT 业为对华出口的主导增长点, 后者则拥有特色农业作为依托。其中犹他州三位众议员中的两位分别参加了“美中工作小组”和“台湾连线”。增长率最低的 10 个选区更为集中, 最低的是怀俄明州单一众议院选区 (-45%), 其余 9 个选区全部来自佛罗里达州。^⑤ 传统上, 两州对华出口化工制品, 如怀俄明的天然碱和佛州的磷酸盐等, 这些产业可能随着中美贸易结构变化而发生调整。^⑥ 其中佛州 9 个选区议员中 7 位参与了不同的涉华连线。

与涵盖选区的区域分布相比, 对华出口额在选区层次的分布情况更为

① 按 2000 年统计依次为 NM-01、KY-05、VA-11、HI-01、VA-08、NV-01、NV-03、HI-02、MS-04 以及 MI-01 等选区; 2008 年统计依次为 WY-AT、NM-01、FL-14、ND-AT、MS-04、NY-16、KY-05、NE-03、FL-02 以及 FL-01 等选区。

② Michael Barone and Richard E. Cohen, *The 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 2008*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Journal Group, 2007), pp. 1102-1103.

③ Ibid., pp. 695-696.

④ 依次为 HI-01、DL-AT、UT-03、UT-01、UT-03、AR-01、WA-04、VT-AT、VA-11 以及 HI-02 等选区。

⑤ 依次为 WY-AT、FL-05、FL-15、FL-14、FL-02、FL-01、FL-13、FL-23、FL-19 以及 FL-22 等选区, 其中前三个的增长率为负, 是仅有的对华出口额降低的三个选区。

⑥ 参见“Soda ash companies enjoy record year,” http://trib.com/news/state-and-regional/article_38e80928-e01d-561f-a3d2-1828574ea5e.html “We help the world grow the food it needs,” http://www.phosphateflorida.com/mosaic.asp?page=about_phosphate, 2010 年 8 月 23 日访问。

复杂，各选区之间在总量和增长率上差距较大，且不平衡。虽然除怀俄明州单一选区、佛州第5和第15选区等三选区外，其他432个选区都呈现增长态势，但总额最大的10个选区对华出口额总计已达全美的17.54%，这也再度反映出分布的不均衡。

二、国会议员的涉华态度

各众议院选区从对华出口中普遍获益的事实，在验证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同时，也有可能对代表各选区的众议员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塑造其涉华态度。这里的涉华态度，即国会议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在更为广泛的涉及中国事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议题上所持有的偏好与立场。这一态度，需要体现在国会议员具体的涉华行为上才能进行测量与分析。

作为立法者，国会议员基于联邦宪法赋予的权力所能进行的涉华行为大致有三种，即加入涉华连线、参与涉华提案、访问涉华地区。三者次序是按从身份认同，到院内立法，再到院外活动的层次递进。

其一，加入涉华连线，即前文提及的议员加入“美中工作小组”、“中国连线”、“台湾连线”以及“西藏连线”等涉及中国议题的非正式连线组织（caucus）。加入涉华连线组织几乎没有成本，但却有助于议员借助中国议题提升影响力。^①因而对非连线领袖的大多数普通成员而言，参与涉华连线至多是一种关注涉华议题的表现，其态度或立场并不足以据此得到明确判断。^②

其二，参与涉华提案，即议员在院会中提出或联署各类与中国事务相关提案的行为。这一行为旨在要求国会通过影响中美关系的立法或表态。

① Susan Webb Hammond, *Congressional Caucus in National Policy Making*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98), p. 116.

② 如前文中所提及的那样，如果选区对华出口额或增长率处于极值状态，其选区议员参与涉华连线的行为则可能存在一定指标意义。

近年来,每届国会中都会出现数百件涉华提案,其中大多持消极态度,虽然其中付诸表决甚至成法者寥寥,但足以在舆论与政治气候上拖累中美关系,值得警惕。^①由于涉华提案的提出和联署都被记载在“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当中,且每个提案都明确围绕具体涉华议题申明立场,因而涉华提案可被视为是议员在担负较大政治责任与压力的情况下,明确表明涉华态度的行为。

其三,访问涉华地区,即议员以官方或私人身份直接访问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行为。近年来,议员外访行为已成为国会任外交领域制衡总统的集中表现之一。根据相关研究统计,1997—2008年的十二年间,国会两院议员仅访台就多达194人次。^②然而,这种走上“涉华第一线”的行为所传达的涉华态度仍需深入观察,与议员本人的任期情况以及其访问的时间点、目的、级别、行程安排等皆有关联。^③

那么,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议员,为什么要参与这些涉华行为呢?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其涉华态度呢?正所谓“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All politics is local),国会议员的涉华行为与国会政治密切相关,与国会议员其他政治行为的动机一致。国会学者理查德·菲诺(Richard F. Fenno, Jr)曾极为经典地指出,议员行为动机不外乎连任、国会影响力以及理想的公共政策。^④这一判断,对涉华行为同样适用。

首先,争取连任对议员最为关键,关乎政治生涯的延续。国会学者戴维·梅休(David Mayhew)曾断言“美国国会议员一心一意追求的目标

① 张光、刁大明 《美国国会议员涉华提案初探》,《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74—98页。

② 张光、刁大明、袁婷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现象研究(1997—2008)》,《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第58—74页。

③ 有研究证明议员外访行为与政治寻租有一定关联,参见 Glenn R. Parker and Stephen C. Powers, “Searching for Symptoms of Political Shirking: Congressional Foreign Travel,” *Public Choice*, Vol. 110, No. 1-2, 2002, pp. 173-191。

④ Richard Fenno, *Congressmen in Committe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p. 1.

就是连选连任。”^① 该动机既体现为对选区事务与诉求的关注与满足，也表现为对本党立场的坚持与维护，在更为频繁换届的众议员身上尤为突出。从选区上看，华裔或亚裔人口分布、地方经济在中美贸易中的利益等，都更可能引发议员的涉华行为，以回馈选区诉求。从政党上看，申明本党对华立场、或出于府会党争等目的操作涉华议题时，^② 议员往往按照本党团要求介入涉华行为，以谋求本党在其争取连任时竞选经费的支持与舆论宣传的背书。^③

其次，国会影响力是议员政治抱负的体现，希望稳固或扩大影响。从经验上看，操作涉华议题本身就是议员提升影响力的捷径，特别是持有消极态度地操作涉华议题，极易吸引公众眼球。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会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也正是因此而一举成名的。^④ 而当跻身为国会领袖后，佩洛西便很少直接抛出涉华议题了。这也说明，资历较浅而非领袖者可能更多操作涉华议题，对华态度消极。此外，众议院内的相关议题委员会（如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也可能出于这一动机采取涉华行动，使其所在委员会成为国会立法过程中的焦点，获得关注与影响力。

最后，理想的公共政策是议员希望得到的立法产出，是以自身立法努力改变政策现状的效果，是参政目标的部分实现。所谓政策的“理想”是指符合议员个人利益、意识形态、信仰甚至兴趣等偏好。正如詹姆斯·麦克考密克（James McCormick）和内尔·米切尔（Neil Mitchell）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国会议员并非只为连选连任，“对于合乎他们意识形态的事

① David Mayhew,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5-6.

② 如在 110 届国会的府会环境下，总统为共和党人，国会两院多数为民主党，民主党就可能提出更多涉华议题，进而制衡白宫的外事决策。

③ Ralph G. Carter, et al., “Setting a Course: Congressional Foreign Policy Entrepreneurs In Post-World War II U. 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No. 5, 2004, pp. 278-299.

④ Ronald M. Peters, Jr., and Cindy Simon Rosenthal, *Speaker Nancy Pelosi and The New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8-39.

业,至少在这些事业不会对其连选连任带来不利的情况下,国会议员会着力追求”。^① 对涉华行为而言,议员个人的族裔可能发挥影响,如议员本人是亚裔或者少数裔则更具关注涉华事务的动机。与此同时,议员的意识形态可能使其对社会主义中国存在某种程度的偏见甚至敌视,导致其消极涉华。

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议员涉华态度。正如前文所述,加入连线组织所表明态度并不明朗,特别是参与“美中工作小组”和“中国连线”,两者一定程度上趋同,区分度有限;^② 访华行为较为复杂,且搜集到较为全面的访华记录目前仍存在较大困难;而涉华提案行为则因其公开性与明确性成为最可能被操作化的数据来源。由于经贸利益需要较长的周期才可能被选民感知,选民相应的行为导致了选举压力,因而本文选取了第110届国会众议院的涉华提案情况,以验证2000—2008年这一时间段内的各国国会众议院选区对华出口的变化与发展对其议员涉华态度的累积影响。

国会涉华提案的数据来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官方网站公布的法案记录,检索关键词设置为“China”,立法阶段选择“House floor actions”(众议院院会表决)。^③ 根据检索统计,第110届国会众议院进行表决且内容提及中国的提案共29件,其中专案涉华者有7件,积极态度1件,消极态度6件。^④ 虽然因均为压倒性投票或口头表决通过而缺乏统计意义,

① James McCormick and Neil Mitchell, “Commitments, Trans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gress: Who Joins the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0, No. 4, 2007, pp. 579–592.

② 刁大明、张光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议题连线构成动因的比较研究》,第101—111页。

③ 具体搜索网址为 <http://thomas.loc.gov/home/LegislativeData.php?n=BSS>。

④ 7件涉华提案分别为 H. CON. RES. 278, H. RES. 422, H. RES. 497, H. RES. 552, H. RES. 1077, H. RES. 1195 以及 H. RES. 1370。其中积极提案为对中国四川省汶川地震表示哀悼,并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问候和信心,而消极提案则涉及中美经贸金融监管、人权与奥运挂钩、台湾、“藏独”、“疆独”以及达尔富尔问题等。

但提案仍具有相当规模的提案者和联署者，最多为 1 人提案、125 人联署，最少为 1 人提案、3 人联署，总计 181 位议员参与了提案或联署。这种专门涉华提案的提出和联署行为可被视为议员涉华态度的明确表现。将唯一的积极态度涉华提案（H. RES. 1195）^① 作为变量“积极涉华态度”，赋值 1 为参与提出或联署，即明显持有积极态度；赋值 0 为未参与提出或联署，即未有证据表明持有积极态度。同时，将 6 件消极提案的提出和联署汇总，设置变量“消极涉华态度”，赋值 1 为参与提出或联署，即明显持有消极态度；赋值 0 为未参与提出或联署，即未有证据表明持有消极态度。由于因变量为被赋值的虚拟变量，且非此即彼，因而本文采取逻辑回归方法加以验证。

自变量部分，体现议员“连选连任”动机的选区因素经过筛选后可以被操作化为对华出口、亚裔比例以及所在区域等变量。为了验证 2000—2008 年对华出口对议员对华态度的影响，“对华出口”具体操作为 2000—2008 年各选区对华出口额及其增长率两个变量。所在区域即前文提及的各选区所在的全美 9 个区域，不同区域政治经济状况迥异，涉华态度也存在区别。同时，体现议员其他动机的国会政治身份包括党派属性（民主党为 1，共和党为 0）、是否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是为 1，否为 0）、是否国会领袖（是为 1，否为 0），以及任期等。此外，议员个人变量还包括是否少数裔（少数裔为 1，非少数裔为 0）、是否亚裔（亚裔为 1，非亚裔为 0），以及意识形态指数 DW 值。其中，DW 值是由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的凯斯·珀尔（Keith Poole）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教授将历届国会中议员投票行为量化而创建的，越趋近于 -1 越自由，越趋近于 +1 越保守。^② 数据来源上，对华出口额数据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官方网站，区域划分来自美国人口普

① 由时任俄勒冈州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吴振伟（David Wu）提出，其他 38 位国会众议员联署。

② Keith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Congress: A 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of Roll Call Vo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查局, DW 值来自珀尔教授的网站,^① 其他变量均源自《华盛顿邮报》官网提供的国会数据库。^②

对于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联, 本文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选区对华出口额越低、增长率越低、亚裔比例越高, 议员资历较浅且非领袖、议员为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 议员为少数裔且持有极端意识形态等, 或者在第 110 届国会中的民主党籍议员, 更容易持有消极涉华态度。反之则更容易持有积极涉华态度。

在进行逻辑回归之前, 所有自变量都进行了共线性检测, 其中只有党派和 DW 具有 -0.944 的强共线性, 其他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0.7, 因而将党派和 DW 值分别放入每组逻辑回归当中, 形成两个模型。

四、主要发现

本文使用 SPSS 11.5 软件, 将各组相关变量分别放入逻辑回归模型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采取 “forward-conditional” 方法进行筛选, 进而得出了表 1 所报告的逻辑回归结果。如表中数据所示, 四个逻辑回归的卡方检验值 (Chi-square) 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而各模型的预测率 (Percent Correctly Predicted) 也得到了不同程度提高。就 “积极涉华态度” 而言, 目前模型 I 与模型 II 的预测率分别为 91.7% 和 91.8%, “消极涉华态度” 在模型 I 的模型 II 的预测率为 69.5% 和 70.4%。同时, 从对数似然比 (-2 Log likelihood) 判断, 模型 II 即 “DW 值模型” 中的该统计量较之模型 I 更小, 即模型 II 为更具显著性的最优模型。

如模型 II 所示, 对于第 110 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涉华态度, 选区对华出

① 珀尔教授的网站为 <http://www.voteview.com>。

② 《华盛顿邮报》国会资料的网址为 <http://projects.washingtonpost.com/congress/>。

表 1 议员涉华态度的逻辑回归模型

	模型 I (党派变量)				模型 II (DW 值变量)			
	积极涉华		消极涉华		积极涉华		消极涉华	
	系数	标准误差 (S. E.)	系数	标准误差 (S. E.)	系数	标准误差 (S. E.)	系数	标准误差 (S. E.)
选区变量								
对华出口总额总量	0. 000 ***	0. 000			0. 000 ***	0. 000		
对华出口增长率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亚裔比例	0. 127 ***	0. 033	0. 078 ***	0. 023	0. 100 ***	0. 034	0. 064 ***	0. 025
新英格兰地区			1. 712 ***	0. 530			1. 172 *	0. 617
太平洋地区	2. 098 **	0. 865			2. 218 **	0. 946		
议员变量								
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	2. 252 ***	0. 438	0. 930 ***	0. 339	2. 499 ***	0. 469	1. 083 ***	0. 366
国会领袖	3. 763 ***	1. 030			3. 953 ***	1. 024		
少数裔	1. 022 **	0. 423	0. 541 **	0. 270				
党派			0. 704 ***	0. 237	—	—	—	—
DW 值	—	—	—	—	-1. 105 **	0. 476	-1. 233 ***	0. 260
常数	-4. 224 ***	0. 396	-0. 832 ***	0. 284	-3. 924 ***	0. 389	-0. 114	0. 288
卡方检验值 (Chi-square)	72. 752 ***		77. 334 ***		69. 186 ***		79. 747 ***	
预测率 (Percent Correctly Predicted)	91. 7		69. 5		91. 8		70. 4	
对数似然比 (- 2 Log likelihood)	180. 019		498. 194		159. 440		427. 212	
样本量 (N)	435		435		435		435	

注：***、**、* 分别代表回归系数在 0. 01、0. 05 以及 0. 10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口变量中的增长率而非总额发挥了更大影响，虽然这一影响略显微弱。具体而言，2000—2008 年各选区对华出口增长率与该选区议员所持有的消极态度呈现出的关系为：各选区对华出口增长率提高，议员参与消极涉华行为、持有消极涉华态度的几率就降低。同时，选区对华出口总额对议员参与积极提案、持有积极涉华态度的影响微乎其微（B = 0. 000），即总额较多的选区，其议员积极涉华行为的可能性相应提高的程度极小。这一结

果说明,对华出口总额较大未必能有效促使其议员对华积极甚至友好,这也有力地回应了前文中提及的拉森和罗拉巴克对华态度“大相径庭”的实例。而选区对华出口额的增长率,即增量却在相比之下更具效果:那些过去数年中对华出口明显增长的选区,更容易感受到中美经贸带来的实惠,更容易通过选区压力等使每两年频繁面临改选的众议员调整为非消极的涉华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整只是保持原状、不参与消极涉华行为,不足以使其参与积极涉华行为、为中国说话。这也反映了目前中国议题在国会政治中的被动处境。

在模型Ⅱ中,亚裔作为一个重要的选区因素也发挥着一定作用,即亚裔较多选区的议员显然更容易出现涉华行为,态度为积极与消极交织。可见,由于亚裔人口中的华裔构成较为复杂,所持政治立场比较多元。其中存在较多爱国人士的同时,也不排除少数鼓吹分裂或消极立场的群体制造选区压力迫使议员参与消极涉华行为的可能。^①这一判断也符合第110届国会众议院1件积极提案向中国汶川地震表示哀悼、6件消极提案涉及台湾、“藏独”、“疆独”、人权等议题的事实。

对于模型Ⅱ中的新英格兰地区、太平洋地区以及DW值三个变量,目前结果所揭示的关系为:新英格兰地区的议员更容易持有消极涉华态度,太平洋地区的议员更容易持有积极涉华态度;而DW值越小、越自由的议员则越容易参与涉华行为,但所持态度为积极与消极并存。事实上,这些因素都可理解为民主党籍议员更多参与消极涉华行为。究其原因,DW值较小者即政治光谱上持有自由派立场者基本为民主党人,且新英格兰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又是民主党的基本盘。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第110届国会所处的府会关系有关:当时民主党时隔12年重掌国会众议院多数,而总统仍是共和党人小布什,构成分立的府会关系。在府会对峙下,民主党人存在操作涉华议题以制衡、影响白宫的动机与可能。同时需要说明的

^① Thomas P. Kim, *The Racial Logic of Politics: Asian Americans and Party Competi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3–104.

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主党人恪守着美国传统自由派精神，在人权与意识形态议题上持有顽固立场，而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党人则可能更多受到选区较多亚裔特别是华裔选民的影响。这就可以解释这两个地区更易持有不同倾向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何 DW 值较小的议员（民主党人）分持两种态度。

此外，模型 II 还存在着众议院国会领袖与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两个变量，对议员涉华行为及态度也形成了影响。一方面，国会领袖更容易参与积极涉华行为。这从一个角度说明第 110 届国会提案行为多是出于府会的党争考虑，往往由国会的党团领袖和委员会领袖参与，以提升立法行为的级别与重要性；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理解为国会领袖层更为重视中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第 107 届国会以来从未提出涉华议题的时任议长的佩洛西再次抛出了涉藏提案（H. RES. 1077），但这种行为在国会领导层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更易参与积极或消极涉华行为，可理解为涉华领域是其委员会管辖领域，为彰显自身在该领域的影响力，议员更有动机参与其中。

五、政策意义

21 世纪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得到持续而稳步的发展，中国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大量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美国对华进出口额也日益激增。美国对华出口的发展变化已对国会议员的涉华政治产生了深刻而关键的影响，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并应针对性地尝试某些政策创新。

其一，应在确保贸易“总量”的同时，着力发展“增量”。研究证明，对华出口总额的多寡不能完全决定其议员对华态度的好坏，而对华出口额的增量与议员对华态度却更具关联——增长越快，该选区议员越不容易参与消极涉华行为。这就意味着，我国在对美国特别是对美国国会展开经济外交时，一方面要注意在那些初具经贸规模的选区“深耕”，通过贸

易结构的升级或优化等方式实现经贸关系的深化以及贸易额的持续增长,同步加强与该部分议员的联络与接触,努力在国会内形成对华态度积极的议员群体;另一方面,更应该着重尽力关注那些以往没有触及或触及很少的选区,加强交流、增进了解,谋求共同利益的契合点、寻找开展互利经贸合作的可能空间,使中美贸易真正惠及更多选区。“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巩固老伙伴,结交新朋友,不但有助于改善中美经贸在美分布不均衡的现实,而且可以使得更多国会议员切身感受到中美经贸往来的实际利益,大大降低其成为国会山上“麻烦制造者”的概率。

其二,应重视对亚裔特别是华裔族群的公共外交。在国会选区大力开展经贸外交的同时,我国还需注重加强对各选区华裔群体的联络、沟通以及动员工作。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充分调动、发挥爱国华裔群体的民意压力,一方面增加议员参与消极涉华行为的选举顾虑,另一方面压缩某些少数亚裔群体操作议题的空间,从而使亚裔或华裔群体成为影响国会政治的积极因素,成为深化中美经贸关系的桥梁。^①

其三,在充分关注选区维度的基础上,有必要关注美国国会政治的变化特点,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积极环境。一方面,我们要深入了解研究美国国会政治的运行机制,利用好府会关系可能创造出的政策空间,降低政党恶斗对中美关系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2010年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在众议院翻盘、府会关系再次陷入分立僵局之际,我国更应该注意利用府会之间掣肘的空间,双方面接触,降低中国议题成为府会争斗工具的可能。另一方面,我国要集中火力,重点发展或改善关键议员所在选区的经贸关系,尤其是外交事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筹款委员会、能源与商业委员会、金融服务委员会等相关委员会成员、涉华连线成员以及国会领袖等,以其在国会涉华政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降低国会可能造成的负面成本。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就业形势堪忧,“中

① 孙哲、李巍 《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第408—409页。

国议题”的炒作呈现出高调回归美国选举政治舞台的趋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足以验证“所有 435 个众议院选区均在不同程度上受惠于对华贸易”，那种为竞选而抹黑中国，阻碍中美经贸关系稳步推进的做法，事实上牺牲的是美国选民的利益，无疑是选举政治扭曲下的短视行为。在如此背景下，我国更应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对美贸易的覆盖面与成熟度，在惠及更多美国普通民众的同时，为其提供更为客观而真实的选项，尽可能避免“民粹主义”驱动议员涉华态度的非理性后果。

作者简介

刁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1 年、2007 年和 2010 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分别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2012 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电子信箱: diaodaming@ gmail. com

陈 冲 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10 年和 2012 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nkchenchong@ gmail. com

王广涛 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2012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9 年在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wangguang33@ 163. com

曾向红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2010 年在兰州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lzdxyyjs@ yahoo. cn

陈一一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2012 年 7 月在兰州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cyyor@ 126. com

张 锋 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电子信箱: fengzhangmc@ gmail. com